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發佈之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改革時代。我刊「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歡迎海內外作者，就中國司法改革、國家治理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景，踴躍撰文討論。

——編者

憲法是發展民族政策的指南

民族問題是中國大陸最複雜、最敏感、最為人迴避的議題。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近四萬字的改革方案中，僅有「貫徹黨的民族政策，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四十個字。如何理解黨的民族政策的要點，〈決定〉並無具體的表述。

中共官方對發展民族政策的話題歷來比較謹慎，學者對發展民族政策的理論討論的熱衷，與現實社會民族矛盾愈來愈顯現一樣，討論的空間不斷擴大並從邊緣走向主流。在這場理論爭辯中，無論是「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主張，還是「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都涉及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憲法確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爭議、非議，雖然官方的態度捉摸不透。

姚新勇的〈中國大陸民族問題的「反思潮」〉（《二十一世紀》2014年2月號）一文，全面回顧了近二十年來學術界關於民族政策發展的理論爭議，分析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了民族政策的核心——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改」、「棄」、「存」、「廢」等的爭議。作者發現，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形成於計劃經濟社會結構下的民族政策，要用於解決當今市場經濟社會結構下的民族問題，似乎存在着難以協調的社會結構性衝突。作者提出採取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及族群文化多元化和公民認同普遍化的措施，來解決社會轉型過程中被忽略、被誤讀的民族問題，以發揮民族政策的社會調節功能，其實包含着的是法律方法。

民族問題去政治化，實質上是要用憲法方法來平衡主體民族與某些少數民族群體的利益衝突，解決民族排斥、民族隔閡、民族矛盾。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用和發展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保持或者改革民族風俗習慣的自由，繁榮民族文化等的實現，既是民族政策發展的核心，也是實施的首要目的，這或是在憲法確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國家的基本制度修改之前，發展民族政策應當聚焦的核心。

周偉 成都
2014.2.24

民族自我認同與國學熱

雷頤的〈「國學熱」、民族主義轉向與思想史研究〉（《二十一世紀》2014年2月號）一文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國學問題上的立場變化進行了回顧，作者對中共歷史的梳理相當清晰。國學與中共的關係，確如作者所述，中共成立之初即以五四運動思想的代表和繼承者自居，以推翻舊世界為己任，通過革命改造中國，所以國學是要被革命的對象。而在文革結束後，「國學突然走紅」。對此，作者認為國家力量在其中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政府通過權威媒體將「國學」定義為中國傳統文化，指出研究國學就是弘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政府還通過發布文件、建設愛國主義基地、編寫《思想品德》教材等對國民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作者指出，中共大力提倡國學的背後，是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轉向，本質是國家權力對傳統文化的控制和利用。

縱觀全文，作者試圖說明中共在中國大陸國學熱中的作用，並視中共為這股國學熱的

推手。那麼，作者如何解釋早於中國大陸興起的港台國學熱，以及海外華人從未丟棄的對國學的熱衷呢？民族主義轉向其實是任何民族國家發展進程中都要經歷的，當權者只不過是順應了時代。

國學熱和民族主義轉向是一個非常嚴肅且宏大的話題，不帶政治觀點去談論它很難深入下去。就當今中國思想史建構而言，缺的不是津津樂道的考據，也不是在瑣碎問題上的糾纏，而是宏觀而又具體地把握歷史矛盾，以及作出政治性的分析和批判。作為讀者，筆者期盼就此問題得到一個剝洋蔥式的解讀。

劉齊生 廣州

2014.2.22

關於饑荒時代的再探析

宋永毅的〈再論糧食戰爭：軍事共產主義和中國大饑荒的發生〉（《二十一世紀》2014年2月號）一文以一種全面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大饑荒，其上至回溯冷戰時代的世界局勢，下至聚焦饑荒年間最普通鄉村中的具體事件，簡明扼要地分析大饑荒的來龍去脈，即毛澤東的軍工強國夢想和獨斷作風最終導致大災難。

從中我們了解到，大饑荒是由多方原因造成，但軍事共產主義的管理結構是造成大饑荒的重要因素。人民公社的建立反映了毛澤東簡單粗暴的前現代發展理念，其核心目標是最大限度地集合與徵收農村資源。公社壟斷一切資源和分配權，農村被分為兩個鮮明階

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大隊書記、大隊會計、民兵隊長，乃至食堂掌勺人都緊緊攥着分配資源的權力，甚至掌握着每個被管理者的生死。具有「高度的組織性與紀律性」的人民公社，對人身有極強的束縛性，組織內的個體對組織有着極強的依賴性，毛時代中國的農村成了一個鐵鑄的大兵營，其嚴密性和強制性在中國歷史中絕無僅有。

這項研究從側面解答了一個一直困擾筆者的問題，即為甚麼饑荒時代沒出現歷朝歷代常見不鮮的民變？當嚴密的軍事化管理體系建立後，一切的資源和人力都掌握在鄉村管理者的手中，壟斷的權力保證了管理層的勢力強大，而被管理者只能像馬克思所描述的無力的、被孤立的「土豆」。當國家決策者決定大力度地殘酷徵收時，這些羊群只能被動地迎接厄運的到來。

霍炫吉 南京

2014.2.23

計量統計的意義與不足

讀畢周陸洋〈《人民日報》「愛國主義」的歷史變遷〉（《二十一世紀》2014年2月號）一文，感到作者用心之細，覃思之深。作者將「愛國主義」這一普羅大眾習以為常、耳濡目染的政治詞彙，用扎實的數據加以爬梳分析，讓我們這一代從小就氤氳於愛國主義氛圍卻從不知曉其複雜意味的人有了恍然大悟的明瞭。

不過，展讀全文數遍也發現了以下白璧微瑕：

第一，作者採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愛國主義」一詞的演變遞嬗，文中的統計數據以及圖表說明無疑增加了文章的說服力。但是作者利用電子資源檢索《人民日報》含「愛國主義」的報導，或許忽略了其他表明愛國主義意思卻並沒有明確出現「愛國主義」字眼的文章；且根據文末註釋顯示，作者並沒有查閱《人民日報》原版報紙，須知查閱電子版與閱讀原版還是有不同的。作者為了讓自己的研判和論斷更加具有說服力，也許有意無意忽視了豐富的歷史細部，隨之而來其歷史感、現場感也付之闕如。

第二，作者把「愛國主義」一詞的變遷歷史分為三個時期，這樣無疑使論述顯得清晰、秩序井然。但在整齊的分期中，對其邊界的含混和交叉地帶卻沒有進行考察，當然作者也交代了由於預設了解釋變量而忽視某些次級變化。

第三，文中出現的「後共產主義轉型」和「新民族主義」等抽象名詞，也許在作者那裏是不言自明的概念，可在不少讀者看來，作者似乎沒有釐清概念而運用。

所以，將社會學研究方法引入文史學科，學者一方面確能革新方法、發現新解，另一方面過於依賴理性分析得出的數據、圖表，或會導致忽視了蕪雜叢生且也複雜豐富的鮮活史料。

朱洪濤 南京

2014.2.22